

Snowden and Greenwald:

The Men

Who Leaked

the Secrets

t h e S e c r e t s

爱德华·斯诺登和与他合作的记者格林·格林瓦尔德的故事，揭示了一些新的细节，比如，格林瓦尔德早年的律师生涯，斯诺登在NSA的经历，以及朱利安·阿桑奇如何在斯诺登的故事中插了一脚。

去

年12月一天早上，格林·格林瓦尔德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查看电子邮件，作出了一个决定，差一点葬送掉他一生最重要的报道。作为专栏和博客作家，格林瓦尔德有着一大批忠实的读者，每天收到几百封电子邮件，有不少来自声称有“好料”的读者。偶尔，这些声明的确名副其实；但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些唠叨抱怨。

因此，在2012年12月1日，格林瓦尔德收到一封短信，寄信的人索要他的PGP公钥（又称加密公钥），要给他发送一封安全的邮件。格林瓦尔德并没有什么PGP公钥，现在他已经意识到，作为一位每天谈论国家安全问题的记者，这是不可原谅的失误，由于公开支持布拉德利·曼宁和维基解密网站，他可能早就被政府盯上了。“我不知道PGP是什么，”他承认说，“我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安装或使用。”这东西看上去既复杂又耗费时间，除了给英国《卫报》写专栏，当时他还在写一本揭露媒体如何控制政治话语的书，没有太多空闲。

于是他忽略了这封短信。很快，发件人又发给格林瓦尔德一份如何加密的详细指南。然后，他发给他一段视频，格林瓦尔德称之为“记者加密教程”，巨细无遗地演示了每个步骤，“完全把我当成了白痴”。

然而，格林瓦尔德依然拒绝学习。“他发来的指南越多，这玩意看上去越复杂，”他说，“我的意思是，我还得看一段坑爹的视频？”格林瓦尔德一直不知道写信人是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说什么。“这就好像第22条军规，除非他告诉我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否则我不会放下手头的工作，站在他的角度，除非我安装上PGP，他不能告诉我任何东西。”

最后，由于一直无法引起格林瓦尔德的关注，那人最终停止了邮件。

格林瓦尔德继续写自己的专栏和书，在这期间还发表了多篇抨击奥巴马政府的关塔纳摩和无人机政策的文章。直到今年5月，在收到神秘陌生人的邮件6个月后，格林瓦尔德再次听到他的消息，这次是通过一个朋友，纪录片导演劳拉·波伊特拉斯。陌生人建议她和格林瓦尔德合作。6月，三个人将在香港的一家酒店第一次见面。在那里，神秘的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拿出数千份秘密文件。中情局副局长迈克尔·莫瑞尔称之为“美国情报史上最严重的秘密信息泄露”。这些文件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几乎无所不在的触角，引发了关于“反恐与个人隐私”的全球大辩

论，让美国政府颜面扫地。它的曝光也是格林瓦尔德独特记者风格的胜利。

格林瓦尔德曾是一名律师，他对公民自由的坚决捍卫让他成为左翼自由派圈子的英雄，与此同时也在精英权贵中树立了很多敌人。一位同事形容他“以惹恼他人的人生使命”。在过去8年里，美国前总统布什、现任总统奥巴马、美国国会、民主党、茶党、共和党都曾是他抨击的目标，他还批评主流媒体讨好权贵。“我渴望这些人的仇恨，”格林瓦尔德在谈到电视评论员、政府官员、智库专家时说，“如果你没有调动人们的情绪，不再挑战任何人，这就意味着你不再重要。”

这种咄咄逼人的风格为格林瓦尔德赢得了大批支持者，尤其是在年轻的、理想化的读者中间。“很少有作家像他一样热衷揭露让人们不安的真相，”斯诺登也是格林瓦尔德的长期读者，他在一封邮件中告诉我，“格林瓦尔德为揭露真相不计代价，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这话同样适用于斯诺登。自从他公开自己就是泄密者以来，主流媒体评论人一直试图剖析这个年轻人。“国父们创建美国并不是为了让一个29岁的小毛头单方面决定什么秘密可以泄露，”《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认为，像很多同辈人一样，斯诺登沉迷技术虚拟世界，不成熟，不堪担负成年人的责任。

在布鲁克斯之流眼中，斯诺登是一个谜；格林·格林瓦尔德却立刻就懂了他。“他没有权势、没有地位，在下层中产阶级家庭长大，默默无闻，再普通不过，”格林瓦尔德说，“他甚至没有高中文凭。但他将要改变世界——我很清楚这一点。”他认为自己也会为之出一份力，“我的整个人生都是在为这个时刻作准备。”

从 很小时候格林瓦尔德就感受到政治的召唤。他们家原来住在纽约皇后区，后来搬到佛罗里达劳德代尔湖区，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少数族裔、工人阶级家庭和富有的犹太退休老人。格林瓦尔德在廉价出租屋中长大，是两个孩子中的老大。他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六七十年代主妇，早早结婚，没有机会上大学。最后不得不靠在麦当劳当收款员和其他类似的零碎工作养活两个儿子。

格林瓦尔德的童年偶像是他的祖父，路易斯·L·L·格林瓦尔德，一位市议员，“标准的20世

纪30年代犹太社会主义者”，为了穷人的利益和邪恶的“公寓楼老板”斗争。在中学时，格林瓦尔德勇敢地竞争市议员，尽管输了却虽败犹荣。“我的祖父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为了捍卫弱者的利益与强权抗争是对个人智慧和精力最高尚的用法。”

对于一个在上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刚刚暴发时，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的10多岁少年而言，这显然是非常有用的建议。“在那时，同性恋被视为一种疾病，你强烈地感到被孤立、被蔑视。”

当然，同性恋少年应对性向的方法各不相同。“有很多人选择了自杀。”格林瓦尔德说，还有一种方式是创造一个另类的世界，以逃避现实世界的批判。“很多同性恋者的创造力或许正是源于此。”格林瓦尔德选择了第三种方式。“我决定向拒绝并谴责我的体制和权威宣战，”他说，“与其让你来评判我，不如我来评判你。”

针对权威的毕生战斗从此开始。最初抗争的对象是老师们的不公裁决。“格林是那种特别聪明、特别讨厌、古怪的孩子，取决于你的幽默感，你要么爱他要么恨他，”他的朋友诺曼·弗莱切回忆说，“他可能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但是，他这样的捣蛋鬼竟然能够毕业也算是个奇迹。”

格林瓦尔德反叛的天性使他成为辩论队的明星，几轮比赛下来，他成了州冠军。1985年，他考入乔治·华盛顿大学，由于花了太多时间在辩论上面，足足用了5年时间才拿到毕业证。取得了近乎完美的LSAT(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的成绩后，他被纽约大学法学院录取，在那里他崭露头角，成为人权斗士。他决定考验纽约大学的自由派声誉，领导了一场运动，成功阻止科罗拉多州的公司参加大学校园招聘，因为该州的选民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推翻了现有的《反歧视法》。

毕业后，格林瓦尔德接受了沃切特利普顿罗森卡兹律师事务所诉讼部的一个职位。该公司号称“美国最残酷的律师事务所”，客户包括众多蓝筹公司，比如美洲银行、摩根大通、美国电报电信公司，等等。工作第一年，格林瓦尔德收入20万美元，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但他发现公司的世界“枯燥乏味，消磨灵魂”，他说：“这种机构让我窒息，像我一样的社会边缘人和那些生而具有特权、缺乏挑战权威意识的人，我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世界观。他们而不是我这样的人最终会成为公司合伙人。”